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策划 张余胜

十六—十八世纪
中亚历史地理文獻

(修订版)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乌兹别克斯坦〕Б. А. Ахмедов 著

陈远光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

山

Б. А. Ахмедов 著
陈远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18 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乌兹)艾哈迈多夫
著;陈远光译. —修订本.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 1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3843-4

I. ①1… II. ①艾… ②陈… III. ①历史地理—古籍—
研究—中亚—16 世纪~18 世纪 IV. ①K93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786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
- | | |
|------|---|
| 书 名 | 16—18 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 |
| 丛书主编 | 余太山 |
| 作 者 | [乌]Б. А. 艾哈迈多夫 著
陈远光 译 |
| 出版发行 |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
| 电 话 |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
| 网 址 | http://www.onbook.com.cn |
| 电子信箱 | press@lzu.edu.cn |
| 印 刷 | 兰州人民印刷厂 |
| 开 本 | 710 mm × 1020 mm 1/16 |
| 印 张 | 28.25 |
| 字 数 | 390 千 |
|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311-03843-4 |
| 定 价 | 85.00 元 |
-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高华

委员 (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颀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 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

出版说明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 and 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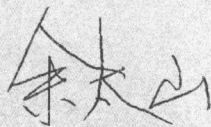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余太山' (Yu Taishan).

2010年6月30日

译者的话

这是一部史科学专著。凡治史者莫不重视史料,所谓“无史料即无历史”之说固然有失偏颇,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说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问题,不通过史料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本书作者艾哈迈多夫先生在前言中特别引证了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并指出:“中世纪史史科学以及任何其他史料性研究之基本和直接的任务,首先在于对历史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和批判性的研究,而批判性研究的前提是要对史料区别对待,善于从中汲取最全面、最重要的科学研究的资料。”

具体而言,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世纪晚期中亚的历史地理文献。所谓“中世纪晚期”就是本书书名所指的16—18世纪。本书所介绍的历史地理文献大体上产生于这一时期,只有个别文献,如《沙哈鲁编年史》超出了这个时段。这些文献大体上也是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但有的也不完全局限于这一时期,如一些通史性著作(《历史精粹》、《传记之友》、《艾布·海尔汗史》、《史记精选》等)从远古讲起,主要是从穆斯林王朝“创世”讲起。但一般来说,所有这些关于16世纪前穆斯林王朝历史的追述,只是编撰,甚至是照搬阿拉伯史学家的著作,既不是这些文献的最重要的内容,也不是史料价值之所在。

本书分上下编。上编介绍本土历史、地理文献37种,下编介绍回忆录和外国旅行记13种。在介绍每一文献时,大体包括有书名、作者、写作时间、体裁、基本内容、特点、史料价值、抄本情况及具体编号、对抄本的研究和版本情况等内容。作者在介绍这些文献时,对其中的有关问题做了考证、勘误,与同类文献进行了比较,对其价值给出了自己的

评估,显示了作者非凡的功力和学识。

正如艾哈迈多夫先生在前言中所指出的,本书没有囊括中亚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部抄本。作者所遵循的原则是有批判地选择,即只汲取那些最全面、最有价值的著作。

文献作者大都是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其身份多是宫廷文人、汗王幕僚、达官亲信。此外还有几类人:一是作者本人是汗王、贵族、重臣。如《突厥人世系》的作者是希瓦汗国著名汗王,《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尔扎·海达尔是朵豁刺惕部的显贵,叶尔羌汗国的重臣。而他的姨表兄,著有《巴布尔回忆录》的巴布尔,是帖木儿王朝的王子,也是在北印度延续数百年的莫卧尔王朝的开国君主。正因为这类作者的特殊身份,他们本人就是当时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积极参与者,所以无论他们怎样描述和评价这些事件,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二是小官吏。如《纳迪尔济世史》、《汗的礼品》的作者,前者是军械库的管理员,后者是汗王图书馆的管理员。他们地位低下,不处在政权的上层,观察问题的视角有其自身的特点。三是外国旅行者和使节。他们中有英国商务代理兼外交官安东尼·詹金森,俄国外交官霍赫洛夫、帕祖欣兄弟、别涅维尼,还有一位新帕特拉都主教赫里桑夫。这些西方人的报告在内容、视角、风格,特别是在写作目的上完全有异于本土文献。

本书作者艾哈迈多夫先生对所介绍的文献的作者只要有资料可查都有详细介绍,从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到著述情况都有介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献内容,而且能从作者个人的经历当中窥视当时的社会情况。

在文献作者的考证上,艾哈迈多夫先生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如开篇介绍的第一部文献《史选,胜利记》,他对该书内容以内证的方式排除了列尔赫、穆克米诺娃、谢苗诺夫、尤金、阿克拉莫夫等学者的意见,谨慎地提出“该书是昔班尼汗身边的一位学者遵照其旨意写的”。

在所介绍的本土文献中,政治史、编年史占有较大比重。如《史选,胜利记》为王朝史,《穆克木汗史》、《克普恰克汗史》、《汗的礼品》为汗国史,《列王世系》为国家关系史,《胜利颂》为韵文体编年史。其

次是传记,如《昔班尼传》是由昔班尼“钦定”的汗王传,《完美精神集》是伊斯兰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大毛拉马哈杜姆·阿扎姆的生平传记,《天堂花园和侍从之林》是伊斯兰朱伊巴尔系霍加们的合传,著名的《巴布尔回忆录》既是回忆录,又是著者的自传。此外还有天文、地理、百科类文献,如《七气候带》、《奇迹集锦》、《土地等级奇迹》、《珍奇之地》,伦理类,如《王诫》,文选类,如《友人纪要》、《穆特里比文选》。在这些文献中,有的是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如《巴布尔回忆录》、《拉失德史》;有的则是残篇断简,如《乌兹别克九十二部名》、《乌兹别克人世系》。特别是后者,仅残存两页纸,却是记录乌兹别克诸部的珍贵资料。

本书所介绍文献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有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学艺术、昔班尼王朝和阿斯特拉罕王朝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各种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上层为扩大自己的领地不断对外征伐,封建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愈演愈烈,封建大地主所拥有的财产令人惊异,他们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压迫剥削不择手段,而劳动人民的处境是如此悲惨,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其处境则更是雪上加霜。如在介绍《乌兹别克诸王录》时,艾哈迈多夫先生引证道:“饥荒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人肉成了人们‘唯一的’食物。死了的人不埋,都被吃掉了。”对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压迫的起义和统治者对起义的残酷镇压,本书也介绍了一些文献中的有关报导。如在介绍《史选,胜利记》时,艾哈迈多夫先生就特别提到了卡拉库尔地区居民的起义和昔班尼军队对起义的残酷镇压。

艾哈迈多夫先生介绍的文献中,大都含有民族构成方面的宝贵资料,艾哈迈多夫先生在书中都一一做了详细介绍。艾哈迈多夫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尽力从我们研究的每一部著作中汲取后来形成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和中亚其他民族的突厥语诸部族的最全面的资料。我们深信,这些资料对研究民族起源和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的形成历史是极其有用的。”《乌兹别克九十二部名》和《乌兹别克人世系》虽然篇幅很短,

但是是探讨乌兹别克族源和部落演变的重要资料,艾哈迈多夫先生把它们收在自己的这一书中,并逐一一列出了 92 部的具体名称。在介绍《沙荣耀录》和《兀拜杜拉汗传》时,艾哈迈多夫先生引述了突厥—蒙古部族的具体名称,它们的分布及其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研究者研究乌兹别克民族和中亚其他突厥语民族族源和形成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在介绍《列王世系》时,艾哈迈多夫先生特别提到该文献中第一次提及了布鲁特部,这是我们在吉尔吉斯民族构成中常遇到的一个部族。在介绍《天堂幸福园》时,提到了文献中有关土库曼诸部的重要资料。

16—18 世纪是伊斯兰教在中亚大发展的时期,其时教派林立,大毛拉、大依禅辈出,伊斯兰神学学派蜂起,本书介绍本土文献时也十分注意这方面的丰富资料。同时,艾哈迈多夫先生也注意到文献中有关中亚民族中仍然存在异教残余的报导,尤其在哈萨克人中更为突出。在介绍《布哈拉宾客纪事》时,艾哈迈多夫先生指出,该书中有许多有关 15—16 世纪哈萨克人生活和习俗的实际资料。如书中说哈萨克人虽然是穆斯林,但他们保留的异教残余很多,如崇拜太阳,崇拜一种萨纳米偶像,使用一种叫亚达的魔石,把穆斯林俘虏当奴隶出卖。此外,在乌兹别克人中也有这些残余,也有多神教徒,在军队驻扎下来时,昔班尼汗用芦苇和草席为他们修建临时神庙。因此,艾哈迈多夫先生认为,说哈萨克人中存在异教残余并指责他们叛教,其实是昔班尼汗和河中地封建贵族对他们进行掠夺性征伐的借口。

从事中世纪中亚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会从本书介绍的文献中了解到他们感兴趣的丰富资料。如在介绍《穆特里比文选》时,艾哈迈多夫先生列举了分散在该文献中的各种职业匠人,如铜匠、压花匠、厨师、指甲花染料匠、鞋匠、马具匠、织布匠、打猎手套缝制匠、制针匠、雕刻匠、镶金匠、首饰匠、皮革匠、制帽匠、裁缝、造锅匠、织毯匠等等。其种类之繁多,分工之精细可见一斑。在介绍《沙荣耀录》这一文献时,艾哈迈多夫先生认为该文献有极其重要的证明 16 世纪手工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和巴里黑等大城市手工业发展情

况的资料。这些城市的手工业匠人生产各种各样的丝绸和棉布、家庭生活用具、金银首饰、武器(各色盾牌以及能发射二三曼重炮弹的炮和弓箭)等。中亚匠人的制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邻国市场上的销路都很好。

在艾哈迈多夫先生介绍的文献中,有大量有关中亚诸汗国国家制度的重要资料。在介绍《布哈拉宾客纪事》时,艾哈迈多夫先生详细引述了文献中昔班尼汗将土地分封其亲属的情况:“把撒马尔罕及撒马尔罕省给了其子默罕默德·帖木儿速檀,把突厥斯坦给了他叔叔忽春速檀,把塔什干省给了他另一个叔叔苏云奇霍加汗,把希萨尔沙德曼给了哈姆扎速檀和马赫迪速檀,把费尔干纳给了贾尼别克速檀,把布哈拉及其所辖地区给了兀拜杜拉速檀,把花刺子模给了默罕默德·帖木儿速檀的儿子普拉德速檀。”在介绍《沙荣耀录》时,艾哈迈多夫先生详细列举了文献中的官品名称,如阿塔雷克、纳吉布、维齐尔、维齐尔阿扎姆、迪万别克、穆什里夫、哈季纳奇、什加乌勒、伊什卡、巴什帕尔瓦纳奇、萨德尔、米拉胡尔、丘赫拉阿加瑟、塔瓦吉、贾尔奇、蒙什、图格别克、库尔奇巴什、巴卡乌勒、法拉什等。艾哈迈多夫先生认为,仔细研究这些资料使研究者不仅能确定这些术语的含义,而且能搞清这些官员的权力、职责和他们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艾哈迈多夫先生还指出,在这一文献中有许多证明穆斯林宗教神职人员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实际资料。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封建统治上层在其一切活动中都要依靠宗教人士,而宗教人士则千方百计支持他们的扩张意图,协助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在介绍《天堂幸福园》这一文献时,艾哈迈多夫先生引述了文献中艾布·哈兹汗将所有乌兹别克人分成四部,称为四土佩的情况,这对研究希瓦汗国的国家制度是很重要的。

军事史学者一定会对艾哈迈多夫先生介绍的文献中有关军队组织,作战队形,战术,兵器(除长矛、弓箭、马刀外,还有圆锤,石弩,喷火器,云梯,火绳炮,铳铁炮等),战利品的分配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等情况感兴趣。如在介绍《布哈拉宾客纪事》这一文献时,艾哈迈

多夫先生明确指出,根据该文献中的资料,游牧的乌兹别克人的军队由步兵和骑兵组成,也有完全由乌兹别克人组成的专门部队。除由从伊奇克部和丘赫尔部中挑选出来的人组成,担任保卫任务,称为汗军的军队外,其他军队都是非正规军,而这些称作汗军的军队其军饷主要由分给汗的战利品支付。在中世纪,甚至在整个封建社会,战利品在封建贵族和普通士兵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封建贵族只拥护那些能征善战,能保证他们获得大量战利品的最高统治者。艾哈迈多夫先生指出,在《布哈拉宾客纪事》中就有胜者把败者全家人俘虏后作奴隶的情况,在《沙荣耀录》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从这一文献中还可以看出,从16世纪下半叶起,他们在军队中开始使用火器——火绳枪和铳铁炮。游牧的乌兹别克人的军队的作战队形虽然陈旧,但出现了一种新的战术——图尔加玛,即从一侧绕到敌军后方,突袭其中心或一个侧翼。在介绍《汗的礼品》时,艾哈迈多夫先生指出,从该文献的材料看,曼格特王朝时军队的结构与蒙古人、帖木儿、帖木儿王朝和昔班尼王朝时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时期军队的组成有了某些变化,这一过程从16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即除在军事征伐时由本部落首领召集的部落民团外,已经有装备火器的常规步兵。炮也有一定改进,除弩炮和一般都是放在骆驼背上或装在车上的所谓喷火炮和引火线炮外,还有榴弹炮、鹰炮。

艾哈迈多夫先生在本书中介绍的一些文献,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地理文献,其中包含那个时代山川、河流、矿产、城市情况的珍贵资料。其中在《突厥人世系》中记述的阿姆河改道的资料是最有价值的,艾哈迈多夫先生详细引述了这一文献中的报导。

中世纪也是中亚文学艺术大发展的时期,艾哈迈多夫先生介绍的一些文献中也有这方面的宝贵资料。《友人纪要》中有关于16世纪上半叶中亚261位波斯语和突厥语诗人的珍贵资料。在该文献所介绍的诗人中,既有昔班尼王朝和帖木儿王朝的统治者,也有商人、手工业者、医生、书法家、画家、学者、建筑师等职业的诗人。艾哈迈多夫先生对穆特里比的文选进行了详细介绍。穆特里比本人就是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头25年杰出的诗人、文艺学家和音乐学家。在穆特里比的《诗

人传记》中,有 16 世纪最后 25 年至 17 世纪初中亚各民族文学、科学和文化状况的丰富的实际资料。当时的诗歌发扬了前人的传统,除原有的基本体裁喀西达、嘎则啦、鲁巴伊、哈吉夫、梅斯涅维等以外,还有基萨(故事),拉蒂法(笑话、俏皮话),穆兹希卡(娱乐、戏言)等类型的诗歌。当时在中亚(主要是在撒马尔罕、布哈拉、巴里黑、塔什干等城)有 300 多位诗人,其中很多人有自己的诗集。在艾哈迈多夫先生对《友人备忘录》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当时还有说书这样一种文学形式。该文献作者在介绍毛拉巴克的生平时,说他经常坐在布哈拉的广场上给听众说各种各样的故事。

艾哈迈多夫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指出:“介绍时我们把重点放在揭示史料内容方面,说明我们认为对当今科研工作有价值的新东西,特别是能够消除中世纪晚期中亚诸民族历史研究中的漏洞、不准确和不清楚的东西。”在读完本书后我们能深刻体会到,艾哈迈多夫先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任务。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昔班尼王朝和阿斯特拉罕王朝更替的时间。在仔细研究了《地理》、《阿拔斯盛世史》、《曼格特、乌兹别克和阿斯特拉罕王朝诸王史》以及《列王世系》等文献中的资料后,艾哈迈多夫先生认为“昔班尼王朝被阿斯特拉罕王朝取代的时间不应该是 1006/1598 年,而应是 1009/1601 年”。

以上列举的只是艾哈迈多夫先生书中展示的丰富内容的东鳞西爪。艾哈迈多夫先生奉献给学术界的这本书,堪称是这一时期史料之海的高度浓缩,相信从事有关研究的学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去阅读,都能有所收获。

治史者都以为治中亚史难,首先就难在史料这一关。中亚是古代几大文明连接的中间地带,因此外界对它知之不多。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研究中世纪以前的中亚史有自己的便利条件,这就是我们还拥有相对丰富、准确的汉文资料。汉、唐、元时期,中国的中央政权在中亚有广泛影响。因此自司马迁著《史记·大宛列传》到其后诸正史中的“西域传”,以及使者、僧人的旅行记,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便是中亚古代历史、地理、民族资料中的珍奇。但是,本书所论及的 16—18 世纪,

即我国的明清之际,正是中国的中央政权对中亚影响最薄弱的时期。明初永乐年间,陈诚数次出使西域,最远达帖木儿朝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所著《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是研究那个时代中亚史的珍贵资料。但是,自陈诚以后至清乾隆中期 300 多年间,中国中央王朝的使臣再没有步入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因此汉文文献中缺少这一时期中亚方面的准确信息。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成书的《西域闻见录》,始有关于中亚地区的广泛论述。但清代著名史家魏源认真阅读后,得出的结论是:“此录于葱岭以西各国,道听途说,十伪六七,不可依据。”(《圣武记》卷 4)

中世纪以前中亚本土文字资料本来就十分匮乏,所使用的文字如粟特文、吐火罗文、佉卢文、古突厥文,都已成为几乎无人识读的死文字。然而,随着阿拉伯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传入,用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察合台文)撰写的“穆斯林文献”开始大量涌现,16—18 世纪正是这类历史文献鼎盛时期。毫无疑问,这类史料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最基本史料。本书作者艾哈迈多夫先生这样规定自己工作的宗旨:“在本书中,我们力求科学地运用 16—18 世纪我们认为最为珍贵的记述性史料,通过 16—19 世纪初在中亚和中亚以外的伊朗、阿富汗、北印度所写的波斯文和突厥文著作,展示这些史料中丰富多彩的部分。”这一时期,包括俄国人在内的西方人也开始进入中亚探险、考察,因此作者在精选大量“穆斯林文献”的同时,也收录了一些西方旅行者的笔记、回忆资料。

艾哈迈多夫先生在本书中介绍到的《拉失德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原民族研究所组织翻译,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我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且在自己的研究中频繁引用。近年王治来先生又将《巴布尔回忆录》译出,199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这两部重要著作被译成汉文。从这一点来看,艾哈迈多夫先生的这部专著应该可以成为有志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学人搜集基本史料的向导,也是从事中亚和新疆历史研究的学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

本书作者布里拜·艾哈迈多夫·艾哈迈多夫是乌兹别克斯坦